

「灌輸論」在中國

• 翟洪峰

「灌輸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著名理論，也是中國所謂「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塊重要基石。「灌輸論」誕生以來，尤其在進入國民教育領域以來，在社會不同階層中引起了持續的關注，既有肯定和捍衛，也有質疑和否定。進入二十一世紀，信息化、多元化、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強勁，具有單一化和強制性特徵的「灌輸論」遭遇了巨大挑戰。

一 「灌輸論」溯源

「灌輸論」的形成、發展過程如同一場理論接力。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構成了「灌輸論」的思想源頭；考茨基(Karl Kautsky)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出色發揮，賦予「灌輸論」較為系統的理論形態；讓「灌輸論」真正揚名的是列寧^①。1899年，列寧起草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1900年創辦《火星報》，並以此為陣地發表〈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等一系列文章；1902年3月出版了《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以下簡稱《怎麼辦？》)。通過這些著作，「灌輸論」發展為完備的理論體系。

列寧在世紀之交頻繁推出這些著作，目的是為了批判當時盛行的工聯主義思潮。正是在對工聯主義的凌厲

批判中，列寧闡發了「灌輸論」的基本要素，即為何灌輸、向誰灌輸、由誰灌輸、灌輸甚麼和怎樣灌輸等一系列問題。

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單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②，形成不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在工聯主義意識的指導下，必然形成工聯主義的政治，「工人階級的工聯主義政治也就是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工人階級參加政治鬥爭，甚至參加政治革命，還絲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政治。」^③可見，工人階級的自發性和工人運動的低水平是「為何灌輸」的主要原因。灌輸的對象自然是處於自發狀態的工人群眾。灌輸的主體，即灌輸者，自然不能是工人群眾，而是「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份子」^④，以及少量脫離了生產勞動的先進的工人領袖。知識份子的灌輸權來自他們掌握了政治知識的創作權，而工人階級據以提高政治意識、告別自發狀態的階級意識——社會主義學說——便是從知識份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⑤。因此，知識份子肩負着向工人階級灌輸社會主義學說的神聖使命。灌輸的形式則是「宣傳」、「鼓動」和「號召」，而報紙和各式各樣的宣傳冊、傳單，以及不同範圍和類型的演說則是灌輸的主要載體。列寧

對「灌輸論」完整而系統的闡述，使《怎麼辦？》成為「灌輸論」的標誌之作。

如何看待列寧的「灌輸論」呢？「灌輸論」應時而生，它解決了當時俄國革命中的迫切問題，肅清了工人階級內部的種種非列寧主義意識，起到了統一思想、凝聚人心、推動革命的巨大作用。然而，列寧著作中的論戰性質卻為其「灌輸論」罩上了濃厚的黨爭色彩。他所批判的經濟派與布爾什維克係盟友關係。兩派對俄國工人運動的主張乃至綱領均存在分歧，但並非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對盟友的過火鬥爭，儘管捍衛並增進了布爾什維克的利益，卻加劇了宗派主義和反民主的傾向。

二 「灌輸論」在中國的流變

毛澤東與「灌輸論」有何關係呢？就筆者的閱讀所見，毛澤東直接使用「灌輸」以及「灌」、「貫注」等近似字眼的情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說：「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⑥第二次是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高潮時期，他說：「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⑦第三次是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他在與毛遠新的一次談話中說：「你們的教學方法就是會灌，天天上課，有那麼多可講的？」^⑧對「灌輸」概念的使用情況是否意味着毛澤東很少受「灌輸論」影響或者乾脆不接受「灌輸論」呢？不是的。相反，毛澤東不僅深受「灌輸論」影響，甚至

根據中國國情發展了「灌輸論」，主要表現為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把灌輸上升到「生命線」的高度。在民主革命時期，他提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 political 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⑨。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又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⑩。「生命線」是形象的比喻，本意是指包括思想灌輸在內的政治工作在革命和建設的各階段都至關重要，攸關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興衰成敗，是黨的各項工作的靈魂。

第二，擴展了灌輸的對象。近代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社會結構落後於俄國。在這樣的國度裏發動革命，必先進行革命啟蒙。啟蒙的對象既包括佔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更包括佔人口多數的農民階級，而對後者的啟蒙顯得更為重要而緊迫。鑒於此，毛澤東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⑪。除工農兩大階級之外，還要團結和教育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革命盟友。

第三，拓寬了灌輸的內容。中國共產黨向民眾灌輸的內容除了列寧所講的社會主義學說外，還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產生的基本理論，以及在基本理論指導下制訂的路線、方針、政策。這還不夠，還要向民眾灌輸時事政治、國情知識、歷史知識等基本常識。

第四，改造了灌輸的方式方法。毛澤東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提出過「團結一批評一團結」^⑫的公式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⑬的方針。尤其突出的是，儘管毛澤東堅持「灌輸論」的原則，卻極力反對思想理論教學中的「灌輸」。他把這種教學方法斥為「注入式」教學法。早在1929年毛澤東主持制訂並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就指出講課應該採取「啟發式（廢止注

入式)」，並且把它列為十條教授法的第一條^⑭。

經毛澤東改造之後的中國式「灌輸論」增加了不少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合理要素。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憑藉「灌輸論」有效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的結合，理論掌握了群眾，革命民眾雙手並用「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⑮，實現了徹底的革命化。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憑藉「灌輸論」，中國共產黨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知識的大眾化和全社會的政治化，維護和增強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及其整合社會的能力。

然而，中國式「灌輸論」也內含着緊張的矛盾和衝突，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陷，對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產生了揮之不去的複雜影響。

第一，放大了「灌輸論」的前提假設。任何意識形態都設置前提假設，「灌輸論」亦不例外。等級人性論是「灌輸論」的基本假設。它把人分為三六九等，懷疑和否定人性的共通性和平等性，認為除了先知先覺外，芸芸眾生缺乏自我完善、自我修煉的能力，而這些能力只能為前者所專有。芸芸眾生必須經由先知先覺的傳道布施、勸說教導，才能克服自身缺陷，提高思想覺悟。而提高思想覺悟的目的和歸宿是服從和服務於先知先覺的理論路線綱領，把自己變成革命的螺絲釘，變成衝鋒陷陣的工具。

第二，灌輸的單向性、強制性愈演愈烈。灌輸必然是單向的正面灌輸，只能歌頌黨、政府和人民的先進思想和豐功偉績。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強調對敵人要揭露不能歌頌，對自己則只能歌頌不能揭露，這與列寧《怎麼辦？》中的邏輯一致。列寧說：「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敵人制度的一種強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敵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暫時的同盟者引

開的一種手段，就是在專制政權的那些固定參與者中間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種手段。」^⑯又說：「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組織起來的黨，才能成為革命力量的先鋒隊。」^⑰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進一步發揮了上述思想，他在1955年所寫的〈駁「輿論一律」〉一文與列寧的《怎麼辦？》異曲同工。毛澤東說：「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份子有言論自由，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⑱又說：「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⑲，但是對反革命就不能用這種辦法，要用「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裏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⑳，並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們的制度」^㉑。

第三，灌輸範圍嚴重泛化。灌輸的對象從政治思想領域全方位進入文化、教育、日常生活等社會各領域，成為執政黨推行全民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金科玉律。至此，「灌輸論」完成了兩次跳躍（稱為「越界」或許更合適）。第一次是從俄國到中國的跳躍，跨越了國界和時界，大體上尚限於政治領域。第二次是從政治領域跳躍到文化、教育、日常生活等領域，「灌輸論」的作用範圍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其根本目標就是在數以億計的國民「靈魂深處起革命」。

「灌輸論」在中國流變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弊端，使自身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甚至連它的「合理內核」也變得微不足道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尊重和高揚人的主體性和差異性，不僅成為教育的主導理念，也成為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對「灌輸論」修補拾掇，令其起死回生的企圖和行為，是徒勞無益的。

三 告別「灌輸論」之後

否定「灌輸論」並非意味着放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一種共有的觀念體系，它至少為社會共同體的大多數成員所肯定、認可和信仰。它從觀念維度維繫和鞏固該社會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一個缺乏意識形態的社會是難以想像的。因此，放棄「灌輸論」，並非意味着取消意識形態，而是要深刻汲取「灌輸論」的教訓，重建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再造當代中國人的共同精神家園。

重建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需要解決兩個問題，即「建甚麼」和「怎樣建」的問題。此兩者都是宏大的課題，需要開動全社會的智慧，依靠全體人民的努力。筆者的看法是，我們要建設的意識形態一定是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意識形態。它應該涵蓋中華民族生活的基本方面，體現中華民族的特性，這些特性符合時代發展的方向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應當是以人為本的，把人當作平等、自由、獨立、協作的人，在意識形態面前人人平等；它能夠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做出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釋，令人心悅誠服、自覺自願地認可、接受和運用這套解釋體系；它並非一成不變，而要適應外部環境（自然和社會）的變化，但又須保持核心要素的相對穩定。

相比之下，第二個問題，即如何重建意識形態顯得尤其迫切而艱巨。「灌輸論」給後人留下一大教訓，即：如果方法和途徑不當，設計良好的意識形態也難以令人信服；方法和途徑得當，即便一個蹩腳的意識形態也會在特定時期攫取人心。而中國共產黨擅長的意識形態工作，如課堂灌輸、

輿論喉舌宣傳、政工人員宣教乃至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等等，均事倍功半，有時甚至起到負面作用。

註釋

① 孫來斌：〈「灌輸論」思想源流考察〉，《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頁119-23。

②③④⑤⑥⑦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17；378；317；317-18；372；372-73。

⑧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511。

⑨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03；497。

⑪ 新華農東方紅教改小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1967），頁33。

⑫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政治工作教研室：《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九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頁6。

⑬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77。

⑭ 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763。

⑮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827。

⑯ 全國普通高校「兩課」教育教學調研工作領導小組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文獻選編（1949-2003）》（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52。

⑰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9。

⑱⑲⑲⑲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157；157-58；158；158。

翟洪峰 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